



西柏坡，一个普通的华北小山村，她的名字却和新中国的出生紧密联系在了一起。昔日的西柏坡村早已淹没于水下，正如当年她孕育了新中国一样，为了当地百姓的福祉，她心甘情愿地把自己贡献了出来——在为了改善民生的水库建设中把自己淹没。在那个硝烟弥漫的年代，新中国的缔造者们栖身于此，一个伟大的红色梦想在此蕴藏、发酵，并最终由这里出发，得以在全国实现。

核心提示

制定《中国土地法大纲》、指挥三大战役、召开为新中国绘就蓝图的七届二中全会，这儿既是红色中国的试验田，也是一个旧世界被打破的最后指挥所，更是今天共产党人心中永远的精神圣地。“新中国从这里走来”，几十年来，这句话如同磁石般将一代代中国人吸引到了这里。这儿虽有如画的风景，却无极致的享受。与任何一个华北村庄并无二样，土坯砌成的墙、灰瓦造就的房，这也是这个旅游村庄里的唯一特色。人们蜂拥至此，是为了心中澎湃着的永恒悸动——对根的本能情愫。

西柏坡 一座小山村与一个国家的建国大业



熟知那段历史的人都会问：为什么是西柏坡？

答案只有一个：看似历史的偶然，却是历史的必然。

河北平山，太行山东麓、滹沱河北岸的柏坡岭下，一个美丽的小村庄名叫西柏坡。70年前，当西柏坡村刚刚成形之时，在此耕作、生活的人们还在提防着日寇的铁蹄，谁也不会想到他们将和一个共和国的诞生紧密相连。

即使是在8年后，当中央工作委员会入驻西柏坡时，乡亲们也没意识到自己的家乡正不平凡起来。而当吉普车载着毛泽东行驶在崎岖山路上时，他已经看到了胜利，他的心里清楚：西柏坡，将成为中国共产党从农村走向城市的最后一个“停靠站”。

历史的无形之手再次显示了其巨大魔力——崛起的东方巨龙，从一个只有几十户人家的小山村里睁开了眼睛，中国命运由此而定。

走过“五重门” 历史选择西柏坡

西柏坡的第一个机会 苏联背约，迁址承德落空

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

9月，当延安的军民仍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时，一架飞机在轰鸣声中降落在了延安。飞机上走下来的，是苏联后贝加尔湖军区总司令马利诺夫斯基的代表鲁罗索夫中校，还有陪同的克林，他刚刚当上沈阳市卫戍司令。

会议认为东北北倚苏联，西接蒙古人民共和国，东邻朝鲜，三面都是友好邻邦，可以集中力量对付一个方向，而且东北工业基础雄厚，物产丰富，一旦重庆谈判失败，可以将东北作为八路军的大后方。毛泽东和周恩来在电报中说：“东北及热察控制在我手中，金党团结一致什么也不怕。”

“抗战胜利后，中共中央就在考虑迁址问题，而在得到苏联不允许任何军队进入东北的承诺之后，第一个理想的迁址地——承德就出现了。”西柏坡纪念馆馆长助理赵福山在接受现代快报记者采访时说。

很快，刘少奇通过电报同毛泽东达成了共识，确立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新的战略决策，并成立了先行警备团赴承德。

这让共产党人看到了和平的曙光。毛泽东甚至在停战令中说：“中国和平民主新阶段即将从此开始”。面对经过了多年战乱的中国人民疲惫的脸色，毛泽东希望通过和平的谈判，而且进一步影响到了斯大林的决策。

后来的史学家认为，鲁罗索夫的这一悲观思想不仅影响到了他同朱老总的谈判，而且进一步影响到了斯大林的决策。

苏联人在谈话中表示，满洲的事情是中国人内部的事情，应该由中国人自己解决，苏联红军不久就会撤退。但是在红军撤退前，无论是蒋介石的军队还是八路军均不得进入满洲。

由于抗战期间八路军在沈阳、

上情况就发生了变化。苏联人变卦了。

这时，中共中央第二个候选地点开始浮现出来。1月27日，周恩来从重庆回到延安参加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通报了重庆的情况后，刘少奇说：“华中我们就保留，也可能党中央将来搬去。”朱德随即表示了相同意见。他们致电华中的陈毅，指出必须巩固华中现有地区，中央机关将来可能要迁至淮阴办公。

当时地处在淮阴地区的淮阴区在陈毅的领导下，政通人和，百废兴，商业发达，文教事业蓬勃发展，成了苏、浙、皖、淮、淮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和水陆交通枢纽，被誉为民主建设楷模。

2月6日，刘少奇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再次指出：如果改组政府确定了，党中央要考虑搬家问题，搬到离国民政府近些的地方。

“所以当时毛泽东见到人就说：‘中共中央准备到清江铺，我准备参加国民政府，做个委员。不过听说南京热得很，我怕热，希望常住在淮阴，开会就到南京，来回跑。’”赵福山说。

消息传到苏皖边区，边区政府立即行动起来，赴清江与淮安交界的洪福乡一带进行实地考察，为中共中央选址。华中分局的部分办事机构从淮安城内的蒋公馆、丁家花园等处迁出，为党中央南迁做好了一切准备。

但历史的车轮并没有就此驶向和平。1946年6月26日，国民党向解放区展开大规模的进攻，全面内战爆发。

和承德一样，淮阴选址因为局势的变化而被放弃，历史再次把机会留给了西柏坡。



西柏坡风景秀丽，土地肥美

西柏坡

西柏坡的第三个机会 蒋介石进攻延安，中央被迫转移

“承德、淮阴的两次选址和中共中央最后移驻西柏坡的情况完全不同。如果没有蒋介石大举进攻延安，毛泽东很可能就从延安直接进了北京城。”赵福山对快报记者笑言，蒋介石又给了西柏坡一次机会。

与此同时，从延安撤出的中央和军委的大部分人员在山西临县三交镇组织了一个中央后委，留在晋绥军区，刘少奇则带领中央工委1500多人一步迈向晋察冀根据地。

很快，名不见经传的西柏坡将在历史舞台上闪亮登场。

西柏坡的第四个机会 停留晋察冀，聂帅力荐西柏坡

虽然公开文件上表明，刘少奇和朱德率领的中央工委转移的目的是晋西北，实际上并不是这样。

“当时主要是为了保密，中央工委真正的目的地是位于邯郸地区的太行根据地。”赵福山告诉快报记者，由于战争形势所迫，中共中央选择转移地点第一是应敌的考虑。

今年84岁的刘长明老人当时在延安中央军委作战科率军作战室临时会议参战，他在接受快报记者采访时回忆说：“当时，敌人50余架飞机、数万炮兵轰炸延安。敌人投下的炸弹好几次都落在毛主席窑洞前，掀起的气浪把窑洞的窗纸都冲破了。”

在敌我力量对比悬殊的危急情况下，毛泽东从整个战略考虑，决定在必要时主动放弃延安。“应该说我们党每一个同志对于放弃延安心里都是不好受的，但这是战术上的需要。”赵福山说，撤离延安前夕，毛主席在接见保卫延安的新四旅以上干部时提出了“存人失地，地人皆存；存地失人，人地皆失”的著名论断。

刘长明回忆说，3月18日黄昏，延安的党政机关和群众已经撤离和疏散完毕，但毛主席和周恩来还是没有走。此时，敌人进至延安南边城的三十里铺，延安城内已听到清晰的枪炮声。“当时彭德怀一直催促毛主席赶快撤离，可是毛主席说：‘不慌，来得及。大路朝天，各走一边，敌人走他的，我们走我们的。好，先吃点饭。’”

而这一留，中央工委就在西柏坡扎下了根。最后又迎来了毛泽东、党中央和解放军总部。

是什么原因让中央工委在晋察冀停下了脚步？赵福山告诉快报记者，因为毛主席给中央工委特别交代了一项任务，在今后一个时期帮助解决晋察冀军事问题。

抗日战争时期，晋察冀根据地被毛泽东誉为模范的敌后根据地，兵强马壮，军事上有什么问题？

面对快报记者的疑问，赵福山笑着告诉记者，主观上，抗战结束以后，由于晋察冀军区领导和平幻想意识比较重，在蒋介石的假和平面具下，“横道”地执行了我党裁军的政策，军队一下子减少了10万人。

“但是很快内战爆发，国民党向晋察冀解放区派出的军队约有40多万人，晋察冀军区兵力不足，且土质肥沃，而且风土人情复杂，不利于保密工作。”赵福山说。

之后，工委首任秘书长、中组部副部长李文率领中央工委的大队人马来到了晋察冀，他又亲自到西柏坡，对这里进行了详细的社情调查，最终确定西柏坡为中央工委驻地。

“中央工委的进驻期在8月，为中央转移驻西柏坡提供了可能。”赵福山说，中央工委进驻西柏坡之后，帮助晋察冀野战军打了四次规模较大的胜仗，歼敌6.2万余人，并于1947年8月12日顺利解放了石家庄。

石家庄的解放使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个解放区连成了一片，不仅奠定了统一华北解放区的基础，也为党中央转移驻华北创造了有利条件。

“实际上毛泽东要求中央工委适当停留一段时间帮助晋察冀解决军事问题是变相地对晋察冀提出批评。”赵福山说。

之后，毛主席就带着中共中央

史料记载，1947年4月26日，中央工委到达晋察冀中央局军区驻地阜平县城庄，此时，晋察冀军区负责人聂荣臻、萧克等人正在石家庄西边指挥正太战役。

5月3日，正太战役告捷，聂荣臻等人赶赴平山县封城村与朱德、刘少奇见面，就晋察冀军区作战经验教训等问题进行了研究讨论。

“当听说中央工委准备到太行区安家时，聂荣臻等晋察冀的领导提出，晋察冀存在许多问题，像如何打仗问题，石门（今石家庄）是京广、德石、石太三条铁路交点，现在还没有解放，张家口又失守，土改问题等，想留中央工委在晋察冀。

刘少奇和朱德商议后，表示同意，但他们做不了主，于是致电还在陕北的毛泽东。5月10日，毛泽东复电，完全同意中央工委留在晋察冀。

“我们当时是这样考虑的，一是村子要适当集中；二是交通要便利，便于和各解放区联系；三是安全问题；四是居住条件。尽管洪子店、郭家、夹峪等村子很大，但目标也大，人多不便保密。”

“通过潘开文回忆，通过他们的勘察，中央工委确实认为西柏坡比较合适，初步选定这里。”

“我们当时是这样考虑的，一是村子要适当集中；二是交通要便利，便于和各解放区联系；三是安全问题；四是居住条件。尽管洪子店、郭家、夹峪等村子很大，但目标也大，人多不便保密。”

“通过潘开文回忆，通过他们的勘察，中央工委确实认为西柏坡比较合适，初步选定这里。”

“我们当时是这样考虑的，一是村子要适当集中；二是交通要便利，便于和各解放区联系；三是安全问题；四是居住条件。尽管洪子店、郭家、夹峪等村子很大，但目标也大，人多不便保密。”

“通过潘开文回忆，通过他们的勘察，中央工委确实认为西柏坡比较合适，初步选定这里。”

问过依然健在的潘开文，潘老回忆这段历史时说：“我们一行奉命带上地图沿滹沱河骑马向上，边走边看，一直走到洪子店，东西黄泥，然后又折回来到西柏坡，夹峪、郭家、朱德、刘少奇见面前，晋察冀军区负责人聂荣臻、萧克等人正在石家庄西边指挥正太战役。”

“而且当时非常凑巧的是，当潘开文一行从滹沱河上游折返回来的时候，还在西柏坡住了一晚上，所以对西柏坡的印象特别深刻。”赵福山说，他也问过潘开文：“当年我们正好走到那天黑了，走不了了，不得不往回走了。”

“通过潘开文回忆，通过他们的勘察，中央工委确实认为西柏坡比较合适，初步选定这里。”

明回忆自己对西柏坡的第一印象时说。

“我理解中央选择西柏坡作为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至少有三个原因：第一，这个地方在过去战争年代是模范村庄，地理环境也比较合适；第二，我们对外讲中央在石家庄，但实际上是在西柏坡，因为保密；第三，西柏坡出于整个战局的中心，正前方，即东面是第三野战军，右翼是第二野战军，左翼是第四野战军，后方则是第一野战军，在战略指挥上，比较便利。”

五大书记会师
毛泽东为何“姗姗来迟”

“5月27日下午，当毛主席的吉普车开进西柏坡大院时，周恩来、杨尚昆、叶子龙等都在院中等候。”刘长明回忆说，让印象最深刻的是，周恩来和毛泽东的手紧握在一起。到了，中共五大书记在西柏坡胜利会师，并最终带领全国人民取得了解放战争的全面胜利，中国的命运就在这个小山村中定下。

不过，令人奇怪的是，中共中

央已于6月1日在西柏坡开始办公，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任弼时四位书记都已齐聚西柏坡，而毛泽东却在5月27日才“姗姗来迟”。这背后又有什么故事？

“当时毛主席在阜平逗留了一阵，主要是准备去苏联访问。”刘长明回忆说，斯大林先后两次邀请毛主席去苏联访问，那时候就准备走，从阜平直接走张家口过去近一点，到西柏坡还要绕道很远。

“当后，工委首任秘书长、中组部副部长李文率领中央工委的大队人马来到了晋察冀，他又亲自到西柏坡，对这里进行了详细的社情